

傳播論壇

傳播研究範式的變更：媒介學的興起

黃旦

摘要

「媒介轉向」已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種普遍趨勢。針對國內的研究狀況，本文將之命名為「媒介學研究」而不是「媒介研究」。媒介研究是將媒介作為一個對象，是關於媒介的研究；媒介學研究是將媒介作為起點，是從「媒介」出發的研究。媒介是構成人類和社會的要素和條件，是媒介學的基本構想；人與媒介的互嵌互為，是媒介學的預設框架；以「媒介」為入射角，揭示人和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狀況、關係構成的樣態及其演變，為媒介學研究的目的。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媒介學研究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不僅在於思想知識的重新學習和組織，更在於思維的根本改變和重整。

關鍵詞：研究範式、媒介、媒介學、媒介化、媒介複雜性

黃旦，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浙江大學數字溝通研究中心教授。研究興趣：傳播思想史、媒介理論、媒介史。電郵：zduangdan@zj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4年5月2日。論文接受日期：2024年6月4日。

Paradigm Shift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ise of Mediology

Dan HUANG

Abstract

The “media turn” has become a general trend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in China, this study calls it “mediology studies” instead of “media studies.” Media studies treat media as an object and encompass studies about the media. In contrast, mediology studies take media as a conceptual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 Mediology assumes that the media are key elements and funda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It is mediology’s default framework that humanity and the media mutually shape and deeply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goal of mediology is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and present conditions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ynamics from a media perspective. A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mediolog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relearning and reorganizing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thoughts. More importantly, it requires a fundamental change and reconfiguration of ways of thinking.

Dan HUANG (Professor).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Digit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theory,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 media history.

Paradigm Shift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research paradigm, media, mediology, mediatization, media complex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D. (2024). Paradigm shift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ise of mediolog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0, 153–184.

致謝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媒介視域下的晚清報紙與上海–江南現代城市共同體研究」(項目批准號：22JJD860001)階段性成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理解媒介」——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 在六十年前的這一振臂倡呼，經過長期沉寂，在近些年來突然產生了巨大的回聲，形成一個「重新理解媒介」的顯明趨勢，媒介甚至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話題。¹ 國內傳播學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傳統的大眾傳播研究日漸式微，看上去只是依靠那些「健康傳播」、「危機傳播」之類的在續命；另一方面，媒介研究卻成了熱潮，新聞傳播學者因此與其他學科的學者，諸如文學、歷史學、哲學、視覺研究、建築學等等開始了手拉手。可以明確地說，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面貌和氣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意味著甚麼、究竟該如何理解、目前存在甚麼問題，下面我想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從媒介出發：研究起點的重構

杭州《都市快報》不久前有過這樣一條報道：一個有著六歲女兒的年輕爸爸，花三個月用大模型做了個講故事的小程序。孩子們可以通過這一程序，上傳頭像後進行數字分身創建，在故事概要裏輸入一句概要或添加關鍵字，選擇相應的朗讀音色和畫面風格，系統就可以用四分鐘時間，生成一本1,000字左右的特定主題童話繪本。這讓人想到了1936年的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2012：95)，他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感嘆，由於印刷報紙的興盛，使口口相傳的「講故事的藝術」消亡，「似乎一種原本對我們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最保險的所有，從我們身上給剝奪了：這就是交流經驗的能力」。可是他絕對料不到，在八十多年之後，「講故事」竟會是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媒介的變化是如此出人意表，又有哪一個人能想到呢？

常常總是想不到的事促發思考。中國傳播研究的變化，首先就是來自這種活生生的現實刺激，原先所接觸的那些傳播研究及其理論，在這樣的情勢面前，顯得是無縛雞之力。用庫恩 (Thomas S. Kuhn；2004)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中的說法，引以規範的那種解謎式研究根本不能解釋新的傳播現實。自美國大眾傳播研究開始，就默認媒介是一個工具，傳播為一種社會功用。所謂的行政學派、批判學派以及文化研究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

文化研究有一個被廣為運用的理論，即霍爾(Stuart Hall；2007)的「編碼與解碼」，其傾力關心的就是「編」和「解」。至於「碼」是甚麼，又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像本雅明的「講故事」和數字的「講故事」，用的是不是同一個「碼」，因此是否需要有不同的「編」和不同的「解」，則是完全置之不論的。

頗含諷刺意味的是，事實上，英國文化研究的出現與大眾媒介的興起有非常直接的關聯。電視時代的大眾文化引領並改造著廣大民眾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既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也是其對象(霍爾，2021)。可以這樣說，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研究取向，實際上就是從英國的歷史和現實，理解大眾媒介文化對於民眾日常生活的意義。可是，他們抓住了文化，重點是文本的內容和思想，卻放過了「媒介」，成了麥克盧漢眼中的那條「看門狗」：撲向鮮美的肉而讓「盜賊」悄悄遁入了家門。大眾傳播研究同樣是這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燈下黑」。我曾做過一個粗略的考察，論定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實是出於兩個不同的媒介來路：前者是印刷，具體一點就是報紙的產物，後者則是由廣播範式所引發。這就造成二者的傳統、關注的焦點以及要實現的目的不一樣。看看美國就明白了，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在建制上常常屬一個學院，其實是各做各事互不關涉(黃旦，2018)。羅傑斯(Everett Rogers；2012：474-475)在《傳播學史》(*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中就例舉過，那些看上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綠眼罩人」和「卡方人」，背地裏卻是互為輕蔑和貶低。國內也是如此。做傳播學研究的認為新聞學沒有學問，吃新聞飯的則笑話傳播學漂浮在理論概念和量化指標之間，不接地氣。這看上去是研究路數之不同，根子則是不同媒介特徵所帶來的教學和學術的不同理解和要求。幾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為甚麼切特羅姆(Daniel J. Czitrom)的《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缺少報紙；戴揚(D. Dayan)和卡茨(E. Katz)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只是針對電視；波茲曼(Neil Postman)正是將報紙和電視拉開尺度進行比照，方見識到電視的「娛樂至死」。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74, p. 22)認定大眾傳播研究沒有出路，理由就是它把研究限定在像廣播和電影這樣幾個少數的領域中。然而，威廉斯(2011：326)對報紙還是不乏好感，認為只要將之栽植在地方共同體經驗之中，就有望培養出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民而不是「大眾」。以往不少關於大眾傳播研究危機的討論中，其獻出的方策，就是要沿著報紙的傳統，具體點說就是以印刷「公共性」來糾偏，哈特(Hanno Hardt)的《傳播學批判研究》(*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就是一例，就像哈貝馬斯要從面對面的口頭交往模式來挽救結構轉型的「印刷公共領域」一樣，殊不知它們本就不是一路。無論何時，只要我們未能對「那些深深嵌入我們對世界的思考的事實中的預設」進行系統的批判，我們就有可能錯誤地瓦解實踐邏輯，使之消解於理論邏輯之中(布迪厄、華康德，2004：41-42)。需要說明，我不以為像哈貝馬斯這樣的思想家不知道口頭與印刷的區別，而且相信他是有意為之，試圖以此確立其理想類型。我的懷疑在於，當媒介發生巨大變革導致公共領域進入一個新的類型時，使勁要拉住逝去的東西來比照求解，可能有效？

在2011年底，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個名為「傳播革命與中國傳播學：超越結構功能主義」學術對話會。「傳播革命」，是一個事實也是提出一種警示。這一年，正好是微信——這一重構中國人在世存有的新媒介產品(孫瑋，2015)的正式推出。這或許是一個巧合，但中國傳播實踐的日新月異是千真萬確的。「超越結構功能主義」，而不是像以往的反思那樣，落在中國經驗和西方理論的適切度上，顯然是要表明，隨著傳播現實的根本改變，整個傳播研究的總體取向和路徑都必須重新討論，蘊含著重建研究立足點的意圖。

之所以要提這個會，在於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有組織地質疑、批判大眾傳播研究的路徑構成，更是第一次就中國傳播研究往何處去提出一個方向。這個對話會的部分成果，第二年以筆談的形式在《新聞大學》上集中刊出。現抄錄一段該筆談主持人語，以見出當時的思考心路，今天的「媒介轉向」實已在這次會議的設想中埋下伏筆(孫瑋、黃旦，2012：2)：

沿著結構功能主義主導的傳播學坦途一路狂奔，我們驀然回首左右顧盼，頓然驚覺，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傳播學問題，長久以來彌漫在幾乎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中，它們都似曾相識，但又那樣陌生。……長久以來，這些另類思考似乎是與結構功能主義並

傳播研究範式的變更

行、甚少交叉的研究路徑。主要涉及：傳播是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儀式；傳播是人與自然、人與神、生人與死者之間的交流；傳播的媒介不僅限於語言、文字、圖像，它還可以是身體、空間、貨幣、城市；傳播的形態可以脫離內容而構成影響社會的重要因素；傳播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方式，建構了最基礎的社會關係，等等。這些另類途徑的價值在於，打開了結構功能主義之外理解傳播的嶄新視野，使得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結構功能主義在傳播學的歷史發展中，突顯和遮蔽了甚麼，中國傳播學如何演變成現在的局面。同時，也呈現出傳播學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可能性以及方式。這個路徑還有一個令人振奮的效果，那就是它聲稱，傳播是人類文明基礎要素之一，它不但潛伏、成形於人類文明的初始狀態，而且在當今傳播革命的背景之下，幾乎變成了任何研究場域中的一個核心問題。

很顯然，會議主辦者所關注的傳播研究版圖，不復是原有主流傳播學的那種框定；他們所認定的傳播，也不復是社會層面上的功用利器，而是構成人類文明的基質。雖然筆談主持人也坦言，「如何將這些另類研究嫁接到既有的傳播學領域中，重構傳播學學科的生長點，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明確指出，「媒介技術」的視角是其中的一個可能（孫瑋、黃旦，2012：3）。當然，不能說後來研究中的「媒介轉向」就是因這個會而起；但在這個會議之後，「媒介」在研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引發更多的研究者的呼應，成為一個方興未艾之生長點，卻也是不爭的實情。

於是，遭主流傳播研究冷落而且被邊緣化的麥克盧漢、伊尼斯（Harold Innis）之類的論著，重新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為「媒介轉向」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源。「人的延伸」、「傳播的偏向」等等，作為知識或許不夠清晰，其材料運用和論證的嚴謹也多有可議之處，但是作為一種思想洞見，一種考察媒介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確擊中了研究者的切身體驗，與現實的傳播技術之變發生了共鳴。社會理論不只是提供我們可以用作思考對象的那些知識，而且會作用於研究對象並改變對象本身（瓦蒂爾，2022：2）。「媒介環境學」的一脈，正是在這樣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意義上，為我們改變對於媒介的認知，將傳播從功能主義窠臼中解放出來，作了最初的鋪墊。

若從理論根本上說，「媒介轉向」的更重要推力，來自於技術哲學。以我個人的體會，其中有兩個人影響巨大：一個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另一個則是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Vorträge und Aufsätze*)中，對那種通行在世且人人皆知的技術觀，即工具論和手段論作了全面的否定。海德格爾(2005：4-5、10)認為，這些在表面上看來無懈可擊的正確看法，未能抵及真實，亦即技術的本質，也就回答不了甚麼是技術的問題：「對於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技術的本質在於開顯，是「解蔽」，「是將合於技術之本質的領域向我們開啟出來」。技術的使用及其如何使用，均是在符合技術特性而且就是在技術的無聲提示中進行的。因此，技術是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決定人與世界的關係，同時也就參與到現實的建立之中。每個時期統治著的技術對每個時期統治著的現實，對自然和世界的存在給予了啟示(紹伊博爾德，1993：17)，起到了構造的作用。海德格爾的這一「追問」，對功能主義研究取向或者說主流傳播學研究範式是釜底抽薪，因為它們完全是深深嵌入在這一通行在世的「技術觀」之中的，並且是以此為默定，方能無所顧忌地把傳播內容當成了研究的所有。天經地義的「媒介工具論」預設被瓦解，研究者們在現實中感到很重要而在理論上一時又說不清的媒介問題，在哲理上得到了澄清，在思路得以打開。順著海德格爾的「技術的追問」走向「媒介的追問」，不過是一步之遙。

海德格爾解開了技術之謎，卻遭受著「主體」之困；技術成為人的「座架」，海德格爾說得很透徹；但該如何安頓人和技術，卻是他沒有理清的。斯蒂格勒恰恰為此掃清了障礙。按照斯蒂格勒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與技術相分離的原初之人。人不像其他動物是自足的，相反，是天生需要技術的貼補。人與技術構成了一種貌似對立的聯體——相關差異體。它們之間是相互往返運動，是一種交合，並由此相互發明，構成了共同的可能性。缺了一方，就甚麼都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斯蒂格勒的論斷並非主觀推斷而是有人類考古學的證據。人的大腦皮層的分裂過程，與石器隨著石製工具技術的漫長進化和演

變的過程是一致的，石器的製作變化過程也就是人化的過程。因而，人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技術性的存在，技術史就是人類史（斯蒂格勒，2012：146–147、154–155）。這樣，技術既不是人的工具，也不是外在的「座架」，是人之為人的構成部分，也就是斯蒂格勒所稱的「代具」。代具作為人的替身，與肉身一體構成「人類」之身。身之不存，人將焉附？人在發明工具的同時在技術中自我發明——自我實現技術化的「外在化」，技術就是人的目的，是人存在的狀態（斯蒂格勒，2012：154、155）。人的天生不足卻因技術反使人有了無限的可能性。古生物學家發現，在東非人之後，出現了一個與「移動－抓取－發音」系統相互依存的整體特徵，即遷移、手工勞作、語言（德布雷，2014：137）。人的演變進程也就是人與技術共同人性化的過程。糾纏不清的技術決定還是人決定的主客體怪圈就此消失。思想的禁錮既被沖決，看待技術和理解媒介，自就有了一個嶄新的立足點。人與技術的互為中介，也使得媒介從一個傳播的輔助手段，一個被動地裝載內容的容器，一躍成為相對於人的存在的根本。媒介這個概念成為一個對人類生命形式進行最深層的考古發掘的工具，媒介研究能夠而且應該被認定為對我們的根本關係的研究（米歇爾·漢森，2019）。媒介的重新定位和價值重估，使得傳播學研究的目標和使命也就不能不發生深刻改變。

我更願意把這樣一種媒介研究的轉向，命名為「媒介學研究」而不是「媒介研究」。這固然是考慮到「媒介研究」的口子太大，可以涵蓋任何與媒介相關的研究，讓人誤以為媒介研究也就是研究媒介。一個術語無所不包，好處是通俗易懂，弊端是會淪為常識。更為關鍵的是，媒介轉向不能被混淆為是一個研究對象的改變，似乎過去是重視內容和效果，現在轉而關心媒介。假若在學術研究上，起點常常就決定了終點，那麼，媒介轉向是要重新確立起點，其起始之處就是媒介。我很贊同法國「媒介學」（*médiologie*）概念的提出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2014：3–4）的觀點，任何一個學科的特徵並不在於其對象，而是其特定的學科主題，亦即其理論入射角。依此而行，媒介學研究是從「媒介」出發的研究，不是關於媒介的研究。我之所以稱之為媒介學而不是媒介研究，就源於這樣的原因。

媒介的媒介化：媒介學的基本設想

從人類社會的歷史看，凡是溝通，比如經驗知識的交流、社會文化的構建、傳統的記憶和承繼，乃至人的嬉笑怒罵，無不是形於色而表於外：物與詞、音與聲、真容與圖像、死亡與墓碑、知識與書籍……，沒有這些有形與無形的相交相乘，也就沒有一切。觀念要有附著，思想脫離不了肉身，意識依賴於大腦，文化意義不能自行起舞，哪怕是對於一個朋友的思念，也是「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這才使得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實際上，人類生物演化的奧秘，就來自於其信息貯存和積累機制(庫日韋爾，2014)。一般的有性生物，由兩種記憶所構成：一是物種的記憶，亦即基因或者種質的遺傳；一為肉體的記憶，它根植於經驗，位於中樞神經系統。但是只有人類，還具有第三種記憶，就是由技術支持、建構的記憶(斯蒂格勒，2019a)。這早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物質與記憶》(*Matter and Memory*)中就說得一清二楚，記憶一定是大腦和物質的交叉點。一位世界頂尖微生物學家曾經打比方說，我們很少把比如蛤、螺類群的外殼和裏面的生命區分開來，那麼，像摩天大樓、購物中心、四處跑的汽車，和種子的莢殼真的有巨大的差別嗎？技術製品和生物的分際本來就是模糊的。把生物和這些生物湊巧創作出的工具硬要區分開來，這不是大自然所為，而是人自身所為(沃爾特，2014：267)。人自身作出「區分」，然後又陷入到自己的「區分」。由此也就難以意識到，人的存在、交往及其文化的創造，本就是以諸多層層疊疊的外在觸接條件為依託的，就像有了電網才可能有璀璨燈火。

威廉斯曾有一個很有價值的看法。他認為社會在結構上是政治、經濟和傳播的三位一體。政治關涉社會的秩序，經濟關涉社會的財富和生活，傳播作為經驗、知識、記憶、傳統等等的學習系統，關涉到社會的組織及其形成。三者平起平坐，各有紋轍又互為涉入，是傳播賦予社會以形式(Williams, 1966, pp. 18-19)。這改變了社會不是政治就是經濟的固有觀念，同時也讓「傳播」升騰到社會的正座。很可惜的是，威廉斯卻止步在了文化觀念、傳統習俗的內容，關注的是其中所隱含的被敘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的意義，以及它們對於社會組織的

影響，而沒有低頭向下，探及內容、意義的敘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的底層構成。否則他就可能會看到，社會是離不開「各種有中介的人類相互關係形式」，而且就是這些「有中介的人類行動的流和序列，以及作為其中介的人為創造的、且因此可變的形式」（休厄爾，2021：323–324），構成了社會。想想最近大熱的電視劇《繁花》給我們所展示的：如果沒有「股票交易所」、「和平飯店」、「外灘27號」；黃河路上的飯店、吃客，以及阿寶、范總、魏總、玲子、李李、汪小姐，乃至開小賣部兼公共電話亭傳呼和包打聽的景秀之類的閃進閃出又斷又連，「繁花」這個社會如何得以綻放，又怎能似錦？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社會，社會的如何可能是與之中介及其綿延密不可分的。

社會的起源是否如盧曼(Niklas Luhmann)所言，「是從語言的演化成開始」尚可討論，但他說「溝通」才是社會系統的運作方式，社會的界限不是領土的界限，而是溝通的界限(伯格豪斯，2016：175、82、83)，是很可取的。正因如此，有學者就提出，在當今新技術創造的全球快速流動達到史無前例的規模和程度時，已有的各種「社會」的界石受到了侵蝕。這不能不使人對「社會」這個概念產生深層次的懷疑，不能不重新思考社會學的學科性質，不能不重新理解各種「社會」的再生產及其各自的特性(厄里，2009)。人堆疊在一起不可能是社會，哪怕是砌磚成牆，也需要灰泥黏合。沿著這樣的思路伸展開去，無論是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社會」——「存在於若干個人有著相互影響的地方」，還是米德(George H. Mead)的「符號互動」、庫利(Charles Norton Cooley)的「鏡中我」、杜威(John Dewey)的「經驗與自然」，乃至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等等，或許都可以有新的解讀和體悟。由於主流的傳播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把目光全都盯在了符號的內容及其產生的效用，這些社會的「中介」流、溝通銜接、交織的軌跡線，則就被擋在了視線之外。傳播學者也就像一般社會學者一樣，落入了人為的窠臼，不是把「中介的興盛」，而是把「通過中介形成的不同社會單元，作為理解社會的起點」(休厄爾，2021：323)。

媒介學就是沿著這樣的路線，把媒介視之為構成人類和社會的**要素和條件**，並以此考察媒介與人、與社會的互為交織、互為激勵、互為轉化、互為生長。這樣的「媒介」，關涉到甚麼是人、甚麼是人的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在，關係到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根基，而不僅僅是一個新的研究層面的開啟。所謂的「媒介轉向」，就是指從這樣的方位重新反思和理解媒介，絕非是要拾遺補缺，把過去遭傳播研究忽視了的「媒介」撈回來，被內容所掩蓋了的「物質性」突顯出來；也不是為了重塑所謂的「多倫多」學派或者「媒介環境學」的地位(相反，他們的觀點也需要在媒介學思路中重新討論和審視)。媒介學是要將人、媒介及世界，作為一個不可分離、互為關聯的整體來看待，以此揭示人和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狀況、關係構成的樣態及其進化和演變。「一個世界的新形式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狀態，而不僅僅是我們對這種狀態抱有的想法：這就是媒介問題的最終研究對象以及它存在的首要原因」(德布雷，2014：118)。在這樣的意義上，媒介學是人類關係和社會進化的演變學，研究的是傳播或交流的設施、手段、符號、制度等交織而成的人類交往環境及其意涵。在這一點上，它相近於交通學而非運輸學，更像地理學而不是地圖學。

這便有了媒介學的預設框架，即人與媒介的互嵌互為。人在使用媒介中被媒介化，媒介在人的所用中被人化；人的意向離不開媒介的意向，媒介延伸之界也就是人的所感所識所達之處。我們總是在光的媒介中看，在聲音的媒介中聽，在語言媒介中交往，在貨幣媒介中交易，是媒介為我們打開一個個區分的區間，在人的感覺、認知和行為中指定一個確定的格式塔(塞爾，2008)。人因為媒介而擁有了橫嶺側峰、鶯聲燕語、五光十色的世界，同時也就不能不在感官的延伸和自我截除中輪迴(麥克盧漢，2000)，也就不能不遭受到各種權力及其規制。無光、無色、無聲、無語言、無交易，就只是一片死寂枯竭的漆黑莽原。這一切足以證明，媒介就是人的境況。立足於媒介與人及其生存的這種根本關係的研究，就是媒介學研究的基本定位(米歇爾、漢森，2019)。

既然人類社會是在「一弦一柱」的關係之網中「築華年」，那麼其文化和文明，或者如莫蘭(Edgar Morin；2011)所指的「時代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在這樣的「媒一介」運動中生生不息。當荷馬史詩「由口口相傳的吟誦變成了桌面上的紙頁窸窣聲」時，「口語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

維方式」(格雷克, 2013: 33) 也就不再。所以中國古人驚嘆道:「筆者, 畢也, 能畢舉萬物之形, 序自然之情也」, 「實天地之偉器也」(王學雷, 2022: 214)! 機械印刷繁衍出四處飛揚無遠勿屆的報紙新聞, 社會長出了一個「公共的頭腦」, 「公共的書信」和「公共的交談」隨之而起(塔爾德, 2005: 235、245), 便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公共輿論」。在中國, 晚清開始的商業印刷, 則使傳統的讀書人轉化為現代文化人, 讀書人社會就此衰落。斯蒂格勒(2019b: 47) 所追溯和指認的變化, 更是令人心驚: 在數字蹤跡自主—自動生產的主導下, 人們正在經歷理論知識的無產階級化, 就像電視的廣播模擬蹤跡導致了生活知識的無產階級化, 機械時代工人身體向機械蹤跡的屈服導致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一樣。看來, 我們不得不接受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2018: 30) 的這個判定: 人類演變是一個進程, 既沒有開端, 也非靜態, 而是在三個基礎面向上交織展開, 即人類、符號(媒介) 和非人類群體的相互混合而流動而綿延。藉此而言, 媒介的歷史不也就是人類文明的演變史嗎?

若立足於媒介的特性及其運作方式, 媒介的歷史或許可大略分為三個段落, 即: 身體媒介(包括讀、寫)、機械複製媒介(如報紙、電影、廣播、電視等) 和數字媒介。不同的媒介, 形成人的不同定位, 生就不同的社會關係和交往構型, 也就產生了面對面交流、大眾傳播、數字溝通等互有區別又互為涉入的不同樣貌。每一個階段的媒介不是單一的, 相反, 媒介總是在複數中存在, 是諸多媒介的組合, 即使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容性的媒介也是如此。沒有一個媒介可以單獨地佔有開發世界的位置(塞爾, 2008: 236)。媒介既是自身的「訊息」, 同時又向著其他媒介的「訊息」, 在區別中產生關聯, 以「互」媒介的形式, 交疊組合成媒介叢。媒介叢總是以某一媒介為主導。這種主導地位及其帶來的溝通偏向, 來自各種因素的耦合(所以才有了所謂的媒介考古, 通過對不同歷史因素的挖掘, 來解構主流媒介史的單一進步線路的敘述。當然, 要警惕由此可能帶來的另一種「還原」想像)。每個媒介叢既受核心媒介系統的影響, 同時又使新舊媒介相互妥協並嵌入到不同時代技術網絡的格局和環境之中, 就像「李普爾定律」所標定的: 每一種新出現的媒介都增加了媒介總系統的複雜性, 並迫使業已確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了自身地位的媒介重新確定其功能的可能性(引自施密特, 2008: 48)。緣此之故, 媒介的時代翻新從類型上看, 似是「一種存在狀態過渡到另一狀態」, 就其實際過程, 則「是意味著一種複雜化, 意味著將一種結構與另一種結構加以迭合, 意味著對同一社會空間中的不同原則進行增值處理或多重處理」(波斯特, 2001: 26), 是一種廢續不斷地「新新不息」(吉特爾曼, 2023)。舊媒介在新媒介的發動和推動下, 改頭換面成為其構成要素而重新粉墨登場。

各種媒介所具的特定可能性, 使它們既自我為界, 又總是以「此界」而聯結「他界」。「界」是界限, 也是通向新域的起點, 就像在橋歸橋、路歸路中達致四通八達。媒介叢就這樣把所接觸到的東西都拉進去捲進去, 讓對象沉浸到這種特殊的、流動的元素之中(布克哈特, 2008: 29)。媒介的世界就像廣袤無邊的原野, 莖根處處叢木連連,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菩提, 在各生所生中糾結纏連, 「欣欣此生意, 自爾為佳節」。媒介的關聯性變化, 就是世界的變化; 與人相關的實存的世界, 就是這樣眾多小世界的共在(加布里爾, 2022)。我們所能觸達的實在, 實乃為媒介的必然對應物, 也就是媒介伸及的必然的對應物(塞爾, 2008)。由此想到了《奇雲》(*The Marvelous Clouds*)——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2020)所著之書的書名。媒介及其運作就是一朵「奇雲」——一個各種形狀在運動的「世界」, 而運動又打破、重組那些形狀。雲始終是一個內部總在經歷變化的結構, 又自我啟動無窮的形式轉換力量(達米施, 2014)。這樣的思維, 接近於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認識論」, 其核心問題從來不是「它是甚麼」, 而是「它朝哪個方向而去」、「多快」、「又和甚麼一道」, 最後「成為或者生成了甚麼」(霍蘭德, 2016: 37)? 這或許可稱為是一個修正了的哲學實在論(塞爾, 2008: 220註1), 我更傾向於用「媒介實在論」, 即: 由於媒介的互聯交互為作用, 也就是「媒介的媒介化」, 不斷「化」成或「化」出了某種有意義的「態勢」或「世界」。順著這樣且只能在這樣的角度中, 媒介可以被理解為在社會層面上所實現的傳播結構, 一種技術形式和文化實踐方式(吉特爾曼, 2023: 6), 它形塑了人與世界的造型: 我抓住了它, 它也抓住了我; 我通過抓住它, 也被它抓住了, 並且被約束在那種循環和傳遞聯繫之中(布克哈特, 2008)。溝通形式的演化和

社會的形構，就這樣不可分離地關聯在一起（伯格豪斯，2016：170）。我們耳熟能詳的「口頭社會」、「大眾社會」、「網絡社會」或「數字社會」之類，在這樣的理解中，或許更能綻露出其真意。

我所指的「媒介的媒介化」，大略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媒介與媒介、媒介與人以及現實世界的聯結；媒介的特性所形成的不同運作及其溝通機制；媒介造就的現實環境、意義及其理解的變化。也就是說，這裏的媒介化，不是庫爾德利 (Nick Couldry) 和赫普 (Andreas Hepp) 所指的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行動者媒介實踐的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群體關係和角色意識的不同（庫爾德利、赫普，2023），而是媒介叢是如何為現實改變提供了可能；人類社會又是如何在既有的條件下，作出各種改變，主動適應並對接媒介的特性和意向，構建出新的生存環境。這也就自然難以避免產生伊尼斯的「傳播的偏向」（凱利，2003），事實上也是在不斷糾「偏」中而不斷「偏向」。因此，在庫爾德利和赫普（2023：51）的媒介技術創新列表上，「機械化」、「電器化」、「數字化」這樣的不同的歷史節點，實現的是不同的「媒介化」，帶來的是不同的「媒介環境」；這之中只有各自延伸的時空和關聯方式的不同，不存在甚麼「深度」或「淺度」的媒介化等級。把本不可度量的媒介聯結形態上的差異，扭變成一個同質的線性進化過程，用一杆刻度不明的「標尺」，來作程度上的比較，且不說這不是媒介學的思路，哪怕從一般媒介社會學來看，也需要慎之又慎。不妨想一下：比如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的「共同體與社會」、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的「有機團結與機械團結」、庫利的「首屬群體與次屬群體」，或者大眾社會和網絡社會，就社會交往及其構成的關係，何以為深何以為淺？如果真的有必要從「深」或「淺」來討論問題，機械媒介的「媒介化」和數字媒介的「媒介化」，也應該是各有各的「深」和「淺」，而不是同一個質地的由淺到深的「媒介化」總體進程。這也是媒介學應取的分析眼光和考察路徑。總之，它是要研究並展示不同的「媒介」是如何運作，又是如何在眾多可能的耦合中突顯並實現了某種可能，改變並形成一種新的關係和態勢。媒介學就是要貼近媒介運作，追蹤媒介的「開合卷舒」，考察人與媒介共同人性化的進程，且如何在熵增的地球上創造人的「永生」（弗盧塞爾，2022：2）。

範式轉變：關於當前媒介學研究的一些看法

一種「範式」的變更，是學會重新看世界，就是認知的新生，其最終結果是對現實理解的模型或者隱喻的根本性改變，故一定是整體性的變化。比如前面提到的威廉斯的「社會」和休厄爾的「社會」，就是兩種不同的範式及其社會隱喻。由此，在媒介學的範式中，第一，傳播一定以媒介為基礎為依託，不存在媒介之外的傳播，也不存在傳播之外的媒介；第二，不同媒介生就不同傳播形態，並通過形態顯現出自己的存在；第三，媒介之間不互相取代，也不互為彌補，而是在不同層面以不同方式各自運轉，既不是一個整體，也不共同組成一個整體；第四，傳播不能抽象為一個信息流通過程，傳播不存在於過程中，而是過程存在於傳播——媒介的延伸之中；第五，人們所知的世界是在與媒介的偶然觸連中的存在。我們通過光來看，借助聲音來聽，人對現實的感知脫離不了媒介的偏向，世界總是「媒一介」了的世界。

依照這樣的設想，媒介學範式的核心乃是「媒介」。對於媒介的認識，既規定了整個研究路數的展開，也包含著對於媒介與人和現實的觀念。可是其難度也正在於此，媒介偏偏是一個不太好拿捏的概念。因限於篇幅，關於媒介，我將另外具文來討論。在這裏只想指出一點，如何確定媒介，的確是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齊林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2020) 的這個說法是沒有錯的，即媒介思想總是與媒介實踐有緊密的聯繫。一方面，我們必須依賴媒介及其實踐建立一種思考媒介的方式；另一方面，媒介思維就已經暗示著建立、製造媒介，規範著媒介的實踐，二者是互相影響的。媒介思想和媒介實踐的互為促發，帶來在不同的思維、視角和針對的問題中，就有著不同的媒介意象。比如延森 (Klaus Bruhn Jensen; 2012: 65–111) 的「媒介」則分別由「物質」、「意涵」和「制度」構成；在基特勒 (Fredirch Kittler; 2013) 的媒介史中，只存在兩類媒介：文字(包括手稿、印刷)和技術媒介(從模擬—數字)；而在以圖像學為業的米切爾 (W. J. T. Mitchell; 2023: 16) 看來，「圖像、聲音、文本，構成了象徵世界再無法簡化的元素。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類型的媒介」。德布雷 (2014: 37–38) 的「中介」(*médium*) 則更麻煩，包含著「符號表示的整體過程」、「社會交流規範」、「記錄和儲

存的物理載體」，以及「同流通方式相對應的傳播設備」四個層面，它們可以相互疊加，卻不相互混淆。這樣的「中介」自然與他要解決的「傳承」有關，也讓他的媒介學範式，主要在於如何傳承，和麥克盧漢的「人的延伸」不是一路，與米歇爾和漢森所謂媒介是人類根本關係的結構，更不是一回事。

媒介的因人而異，可以讓研究豐富多彩，同樣也會讓研究過於發散，目前很難說已經形成一個媒介學研究的共同範式。研究者們大都是從自己的問題出發，來探索各自的研究路徑。探索總是有益，在探索中某些經驗的片段就有可能突然以一種新的方式整理並整合起來，這常常是範式革命的一個特徵(庫恩，2024)，但未必就是其必然結果。從國內的研究來看，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聚集在媒介的周圍。這是好現象，表明媒介轉向因為切中大家的現實感受而激發起研究的興趣，更不必說是否具有一個學術共同體，的確也是衡量一種範式是否形成的尺度。然而，透過這種熱鬧的景象，不難看出，目前的這些研究大多還是停留在研究對象本身。也就是說，學術興趣點的確發生了變移，但範式意義上的研究視野和思維之改變，並不十分明顯，似仍處在將變未變之中。揆諸其實際，有兩種主要表現值得警惕：一種是「打移動靶」式的研究，即總是伸頭向前追，緊盯新技術的最新變化，從微信、短視頻、表情包、彈幕、直播間、虛擬現實、元宇宙直到AI大模型、智能機器人等等，「露頭即打」，頗似一個「信息時代的獵人和採集者」(梅羅維茨，2002：307)。也有的是轉身向後，把歷史上的一些手工的或機械的器具一個一個搜尋出來，比如轎子、輪船、鏡子、顯微鏡、望遠鏡、照相機、打字機、火等等，然後貼上媒介標籤殺一個回馬槍，就像一個數字時代的「拾穗者」，在漫漫的「器物」田野中，不斷探尋並彎腰撿起失落的「麥穗」。這些研究的站立點大多是固定的，以一個實體的「媒介」來對應萬變的器物，表明它們均為媒介。另外的一種則反其道而行之，我稱之為「移動打靶」式，即跟著最新理論概念走，看見一個新說法，就急不可待地拿來演說一遍，甚麼「中介」、「裝置」、「聯結」、「互嵌」、「可供性」、「調節」等等，走一步打一槍，移步卻從不換景，從不同的角度來瞄準擊打那個穩如泰山的「媒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從一般性來說，「打靶式」研究與個人的學術訓練和領悟有關，但從媒介學的角度，則是缺少如齊林斯基所說的一種思考媒介的方式。概念用了，思維沒變；或者對象變了，理論仍舊，無論換穿甚麼新鞋，走的都是老路。更加典型的是有關「媒介性」。米歇爾和漢森(2019：4-5)為了理清具體媒介的多樣性和媒介概念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為了對媒介研究有所限定，就化繁為簡，將「media」推定為一個集體單數名詞的「媒介」，作為所有各種具體形式媒介(medium)均不可或缺的「媒介性」——人與技術的互為協商和調節。在他們看來，「具體的技術過程總是與人類感官及人的理解率相結合，總是在對給定的時間、空間中的人類經驗進行調節」。「媒介性」一經引入，即受到廣泛注意和徵引，研究者們興奮不已，好像手中有了一根點石為金的魔杖，「調節」一詞頓時滿天飛。無論其所指的是甚麼東西，也不論是否真的體現出甚麼「調節」，只要按上這兩字，就是「媒介」，就自以為在做媒介學研究。

米歇爾和漢森對「media」和「medium」作這樣的區分，的確為如何思考具體的媒介(medium)，起到了一種思路上的引導。此後凡是談medium研究，就不能孤立地就物論物，一定需要置於media的抽象意義之下。然而，「媒介性」或「調節」意在為如何看媒介和研究媒介提供一個切入的角度。切入點不是研究，不過是研究的一個開始，而且討論媒介性問題的並不只是前面的兩位，不同學者之間的理解也有不同。更關鍵的是，既然「媒介性」(media)是對各種媒介的抽象，就必然是落在許多具體的medium之中的。這也就是說，不同的媒介是有著不同的「媒介性」具體表現的。研究需要從具體的媒介中揭示出特定的媒介性，而不是用一個「媒介性」來統括所有。在1964年有一個新編的現代京劇，名為《雪花飄》，說的是一個機車工，退休後在家裏申請裝了一個公共電話，做起了左鄰右舍的電話傳呼員，其中就有這樣的唱詞：「打罷了新春六十七，看了五年電話機」，「又誰知這小小的電話有如此的威力，它把我和全城連在了一起共同呼吸」。這讓人想到另一首曾經婦孺皆知的歌曲，即聶耳作曲的《賣報歌》，裏面所唱的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電話和報紙，都可以是媒介，都具備「媒介性」，即所謂的「調節」，但「連在了一起共同呼

吸」的是電話而不是報紙。電話的傳呼是人的直接中轉，「今天的新聞」是間接的，是從與「新聞」無關的第三者——「賣報的小行家」處獲取，並為此要從口袋掏出「七個銅板」。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阿道爾諾 (Theodor W. Adorno; 2003: 136) 曾把電話和廣播作過類比，結論是：電話和廣播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作用，「電話還依然可以使每個人成為一個主體，使每個主體成為自由的主體。而廣播則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參與者都變成了聽眾，使所有聽眾都被迫去收聽幾乎完全雷同的節目」。在弗盧塞爾 (Vilém Flusser; 2021: 41) 看來，今天的傳播又是另一番景象，變成了以技術圖像為中心，「它們向四周滲透，所以人們不會擁擠在它們的周圍，而是向後退，進入各自的角落。技術圖像輻射四周，每條射線的一端都單獨坐著一個接收者。就這樣，技術圖像把社會掰碎，散播到各個角落」。這就很容易讓我們想到 ChatGPT 或者 Sora，作為人類心智的外化，它們不是人與世界的中介，而是人所要理解和依賴的世界。當「世界」成為了一個媒介，而不再是被容納進一個媒介時 (延森, 2012: 86)，人的定位就發生變化。人無需借助媒介通達世界，倒是「世界」——技術性影像展示著一個方向，成為一種指引性的程序 (弗盧塞爾, 2021: 33)，促迫著人的認知和行動，這或許可稱為一種「增強人類」，用一位哲學家的說法，是通過「技術升級」來改進、完善人的存在的功能 (趙汀陽, 2022: 70)。智能媒介的此種特殊性，必定關係到主體的變化，屬「跨主體性」的範疇。不同的主體，包括人以及技術可能產生的新主體們，會導致真實世界的概念發生改變，這將使得「跨主體性」問題更為明顯、重要和複雜 (趙汀陽, 2023: ii)。這一切，都提醒我們在「媒介性」的理解和使用上，務須慎之又慎，切莫依樣畫葫蘆而失去了分寸。

由於媒介的問題關涉到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媒介學研究範式的變更，自然不是以原有的學科分類為限度，而是要像媒介一樣，伸向四面八方重新整理和整合。顯而易見，媒介學研究首先需要大量的新的閱讀。「新」既包括最新的研究和理論，也包括從媒介學角度對原有的傳播學經典著作的重新梳理和理解，抓取出以往未能體悟到的新意義。舉一個例子，凱瑞 (James Carey) 的《作為文化的傳播》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觀點犀利，洞見叢生，加上文筆優美，沒有學術著作慣有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酸腐氣，是進入傳播研究必讀的入門書。就在這本書中，凱瑞對於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杜威的思想交鋒有一個非常精彩和獨到的分析。凱瑞(2005: 56-59)認為，李普曼基於「視覺」的隱喻，傳播被理解為是看清事物的一條途徑，所以痴迷於「景象」，諸如「視覺、情報、製圖、圖畫」、統計材料之類的可見物；杜威則是從「聽覺隱喻」出發，把語言作為一種交流而不是再現的行為裝置。因而真理和真相不是看見的而是從聽中得來，它只能產生於話語的交流之中。可見李普曼和杜威是活在各自的媒介體驗中，看似相同的話語，指向的卻是不同的現象。由此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討論真實或虛假，公共與非公共，看起來都是不能脫離具體媒介語境的。媒介即隱喻，不只是存在於普羅大眾之中，學者們同樣難以避免。波茲曼自己不就是以報紙為隱喻的嗎？可是，囿於既有的思維，以往對此關注的人似乎不多，否則，關於數字時代的「後真相」、「公共性」之類的討論，應該就有不同的想像。

因而，在「媒介學」轉向中，一方面要大力倡導敞開眼睛，關注不同學科的優秀論著，另一方面要帶著新的問題和思考來讀，而不是把一般意義上的文本解讀當成了研究。讀書或許有助於推動思考，卻不會自然解決問題。獲得新知的興奮距離運用新知的研究，還有十萬八千里。把紙上得來的東西通過一般邏輯敷衍成篇，不過是讀書筆記，為研究之前的一種案頭準備。以為思想史研究就是洋洋灑灑羅列文獻作解說，其結果會造成既無思想也無歷史，充其量是歷史學的「思想」文本排列或「思想」文本排列的歷史學。抽離了文本的具體前提和語境，把相干和不相干的東西自然化而相互辨認印證，說明「是甚麼」或「不是甚麼」，最好也不過是知識點的澄清。證實或證偽，都構不成研究，除非背後隱藏著或者牽連出甚麼問題。誤將讀書之樂，掉書袋之趣，當作是一種研究，鑽在裏面不能自拔，那麼，文本閱讀的豐富帶來的恰是思想的自閉。因為無論閱讀多麼廣博，其終究被約束在文本的意義世界裏而與真實世界拉開了距離，文本從思想的來源變成了思想的界限，取代了本源的問題而成為虛空的根據，猶如海德格爾(2004)說的，傾聽不到存在之事的聲音。當真實問題替換為文本問題，生活空間換位為文本空間，思想就失去了創造性，研究也就成了從文本到文本的編織作業。這樣的媒介學研究是不可能前景的，更

不必談甚麼範式的轉變和建立。如果「作者」最初的意思是「保證生長的人」，而不是拿來、概述或簡寫他物的人(塞爾、拉圖爾，2024：127)，那麼，成為這樣的「作者」，作出有切實經驗基礎的研究，說出自己切實見解的話，以促進媒介學研究的生長，而不是「為賦新詩強說愁」，就是每個媒介學研究者理應努力的目標。

媒介學是一種認識的新形式，而不是知識的特殊來源(德布雷，2014)。認識的新形式，意味著「而今邁步從頭越」，意味著研究思維和視野的根本調整。這絕非輕而易舉。「今天，性命攸關的問題不僅僅是學不學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再學習的問題，而是重新組織我們的思想體系，重新學會怎樣學習」(莫蘭，2002：16-17)。這，既是媒介學研究的希望所在，也是媒介學研究者應該具有的意識、追求和努力。

註釋

- 1 在今天的學術氣候中，稱媒介是人文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話題，沒有絲毫的誇張(米歇爾、漢森，2019)；隨著從本體論、認識論到語言學轉向，現在則是要向媒介中心轉移了(克萊默爾，2008)，甚至已經到了提出一種媒介哲學的時候了(彼得斯，202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E·M·羅傑斯(2012)。《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殷曉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Rogers, E.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 E. M. Luojiessi (2012). *Chuanboxue shi—Yizhong zhuanjishi de fangfa* (Yin Xiaor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Rogers, E.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 W·J·T·米切爾(2023)。《元圖像：圖像及其理論話語》(唐宏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W. J. T. Miqieer (2023). *Yuantuxiang: Tuxiang jiqi lilun huayu* (Tang Hongf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W · J · T · 米歇爾、馬克 · B · N · 漢森(編)(2019)。《媒介研究批評術語集》(肖臘梅、胡曉華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Mitchell, W. J. T, & Hansen, M. B. N. [Eds.] [2010].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 J. T. Mixieer, Mark B. N. Hansen (Eds.) (2019). *Meijie yanjiu piping shuyuji* (Xiao Lamei, Hu Xiaohua, Trans.).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itchell, W. J. T, & Hansen, M. B. N. [Eds.] [2010].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于貝爾·達米施(2014)。《雲的理論：為了建立一種新的繪畫史》(董強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原書 Damisch, H. [1972]. *Théorie du nuag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s.)
- Yubeier Damishi (2014). *Yun de lilun: Weile jianli yizhong xin de huihuashi* (Dong Qia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meish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amisch, H. [1972]. *Théorie du nuag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s.)
- 小威廉·休厄爾(2021)。《歷史的邏輯》(朱聯璧、費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Sewell Jr., W. H.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Xiaoweilian Xiueer (2021). *Lishi de louji* (Zhu Lianbi, Fei Yi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ewell Jr., W. H.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瓦爾特·本雅明(2012)。〈講故事的人〉。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頁95-11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H. Arendt, Ed.; H.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Waerte Benyaming (2012). Jiang gushi de ren. In Hanna Alunte (Ed.), *Qidi: Benyaming wenxuan* (Zhang Xudong, Wang Ban, Trans.) (pp. 95-118).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H. Arendt, Ed.; H.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王學雷(2022)。《古筆》。北京：中華書局。
- Wang Xuelei (2022). *Gub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加布里埃爾·塔爾德(2005)。《傳播與社會影響》(特里·N·克拉克編；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iabuliaier Taerde (2005). *Chuanbo yu shehui yingxiang* (Teli N. Kelake, Ed.;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 (1998)。《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aier Budie, Huakangde (1998). *Shijian yu fansi: Fansi shehuixue daoyin* (Li Meng, Li Kang,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 (2013)。〈傳播媒介史緒論〉(黃淑貞譯)。陶東風(編)，《文化研究(第13輯)》(頁235–25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Fulidelixi A. Jitele (2013). *Chuanbo meijieshi xulun* (Huang Shuzhen, Trans.). In Tao Dongfeng (Ed.), *Wenhua yanjiu (di 13 ji)* (pp. 235–254).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尼克·庫爾德利、安德烈亞斯·赫普 (2023)。《現實的中介化建構》(劉泱育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Couldry, N., & Hepp, A. [2017].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Nike Kuerdeli, Andelieyasi Hepu (2023). *Xianshi de zhongjiehua jiangou* (Liu Yangyu,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ouldry, N., & Hepp, A. [2017].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托馬斯·庫恩 (2004)。《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omasi Kuen (2004). *Kexue geming de jiegou* (Jin Wulun, Hu Xinhe,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托馬斯·庫恩 (2024)。《結構之後的路：哲學論文(1970–1993)與自傳性訪談》(丘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Kuhn, T. S. [2000].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omasi Kuen (2024). *Jiegou zhihou de lu: Zhexue lunwen (1970–1993) yu zizhuanxing fangtan* (Qiu Hui,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uhn, T. S. [2000].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2008)。〈傳媒：傳播與認識的結合〉。西皮爾·克萊默爾(編)，《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像和新傳媒》(孫和平譯)(頁46–6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Xigefulide J. Shimitte (2008). Chuanmei: Chuanbo yu renshi de jiehe. In Xipier Kelaimoer (Ed.), *Chuanmei, jisuanji, shizaixing—Zhenshixing biaoxiang he xin chuanmei* (Sun Heping, Trans.) (pp. 46–63).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西皮爾·克萊默爾(2008)。〈作為軌跡和作為裝置的傳媒〉。西皮爾·克萊默爾(編)，《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像和新傳媒》(孫和平譯)(頁64–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Xipier Kelaimoer (2008). Zuwei gui ji he zuwei zhuangzhi de chuanmei. In Xipier Kelaimoer (Ed.), *Chuanmei, jisuanji, shizaixing—Zhenshixing biaoxiang he xin chuanmei* (Sun Heping, Trans.) (pp. 64–85).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尤金·W·霍蘭德(2016)。《導讀德勒茲和加塔利〈千高原〉》(周吟吟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原書Holland, E. W. [2013].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Youjin W. Huolande (2016). *Daodu Delezi he Jiatali Qiangao yuan* (Zhou Xiyin,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olland, E. W. [2013].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米歇爾·塞爾·布魯諾·拉圖爾(2024)。《我不想保持正確：拉圖爾對塞爾的五次訪談》(顧曉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Serres, M., & Latour, B. [1994]. *Eclaircissements: Cinq entretiens avec Bruno Latour*. Paris: Flammarion.)
- Mixieer Saier, Bulunuo Latuer (2024). *Wo buxiang baochi zhengque: Latuer dui Saier de wuci fangtan* (Gu Xiaoya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erres, M., & Latour, B. [1994]. *Eclaircissements: Cinq entretiens avec Bruno Latour*. Paris: Flammarion.)
- 克勞斯·布魯恩·延森(2012)。《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劉君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Jensen, K. B. [2010].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laosi Buluen Yansen (2012). *Meijie ronghe: Wangluo chuanbo, dazhong chuanbo he renji chuanbo de sanchong weidu* (Liu Jun,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ensen, K. B. [2010].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貝爾納·斯蒂格勒(2012)。《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Stiegler, B. [1994].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1. La Faute d'Epiméthée*. Paris: Editions Galilee.)
- Beierna Sidigele (2012). *Jishu yu shijian: 1. Aibimixiusi de guoshi* (Pei Cheng,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tiegler, B. [1994].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1. La Faute d'Epiméthée*. Paris: Editions Galilee.)
- 貝爾納·斯蒂格勒(2019a)。〈記憶〉。W·J·T·米歇爾、馬克·B·N·漢森(編)，《媒介研究批評術語集》(肖臘梅、胡曉華譯)(頁59-76)。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Mitchell, W. J. T, & Hansen, M. B. N. [Eds.] [2010].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ierna Sidigele (2019a). Jiyi. In W. J. T. Mixieer, & Make B. N. Hansen (Eds.), *Meijie yanjiu piping shuyuji* (Xiao Lamei, Hu Xiaohua, Trans.) (pp. 59-76).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itchell, W. J. T, & Hansen, M. B. N. [Eds.] [2010].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貝爾納·斯蒂格勒(2019b)。《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張福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Beierna Sidigele (2019b). *Nanjing kecheng: Zai renleiji shidai yuedu Makesi he Engesi—Cong “Deyizhi yishixingtai” dao “Ziran bianzhengfa”* (Zhang Fugong, Trans.).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岡特·紹伊博爾德(1993)。《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宋祖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Seubold, G. [1986]. *Heideggers analyse der neuzeitlichen Technik*. Baden-Baden: Verlag Karl Alber.)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70 期 (2024)

- Gangte Shaoyiboerde (1993). *Haidegeer fenxi xinshidai de jishu* (Song Zulia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eubold, G. [1986]. *Heideggers analyse der neuzeitlichen Technik*. Baden-Baden: Verlag Karl Alber.)
- 奇普·沃爾特(2014)。《重返人類演化現場》(蔡承志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Walter, C. [2006]. *Thumbs, toes, and tears, and other traits that make us human*. New York: Walker & Co.)
- Qipu Woerte (2014). *Chongfan renlei yanhua xianchang* (Cai Chengzhi, Tran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Walter, C. [2006]. *Thumbs, toes, and tears, and other traits that make us human*. New York: Walker & Co.)
- 約書亞·梅羅維茨(2002)。《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eshuya Meiluoweici (2002). *Xiaoshi de diyu: Dianzi meijie dui shehui xingwei de yingxiang* (Xiao Zhijun, Tran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約翰·厄里(2009)。《全球複雜性》(李冠福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Urry, J. [2002].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Yuehan Eli (2009). *Quanqiu fuzaxing* (Li Guanfu, Trans.).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Urry, J. [2002].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約翰·杜海姆·彼得斯(2020)。《奇雲：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uehan Duhaimu Bidesi (2020). *Qiyun: Meijie ji cunyou* (Deng Jianguo,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威廉·弗盧塞爾(2021)。《技術圖像的宇宙》(李一君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Flusser, V. [1985]. *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 Berlin: European Photography.)

- Weilian Fulusaier (2021). *Jishu tuxiang de yuzhou* (Li Yijun,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lusser, V. [1985]. *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 Berlin: European Photography.)
- 威廉·弗盧塞爾 (2022)。《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斯特凡·博爾曼編；周海寧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Flusser, V. [1998]. *Kommunikologie*. Berlin: Fischer-Taschenbuch-Verlag.)
- Weilian Fulusaier (2022). *Chuanboxue: Lishi, lilun yu zhexue* (Sitefan Boerman, Ed.; Zhou Haining,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lusser, V. [1998]. *Kommunikologie*. Berlin: Fischer-Taschenbuch-Verlag.)
- 帕特里克·瓦蒂爾 (2022)。《社會學的知識》(王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Watier, P. [2000]. *Le savoir sociologique*.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 Patelike Wadier (2022). *Shehuixue de zhishi* (Wang Yu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atier, P. [2000]. *Le savoir sociologique*.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 馬克·波斯特 (2000)。《第二媒介時代》(范靜曄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Poster, M. [1995].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ke Bosite (2000). *Dier meijie shidai* (Fan Jinghua, Trans.).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oster, M. [1995].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馬歇爾·麥克盧漢 (2000)。《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Maxieer Maikeluhan (2000). *Lijie meijie—Lun ren de yanshen*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Original book: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馬丁·海德格爾 (2004)。〈面向事情之思〉。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存在哲學》(孫周興等譯)(頁 110–156)。北京：九州出版社。
- Mading Haidegeer (2004). Mianxiang shiqing zhi si. In Mading Haidegeer, *Haidegeer cunzai zhexue* (Sun Zhouxing et al., Trans.) (pp. 110–156).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 馬丁·海德格爾 (2005)。〈技術的追問〉。馬丁·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頁 3–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Heidegger, M.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Verlag Günther Nesk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Mading Haidegeer (2005). Jishu de zhuiwen. In Mading Haidegeer, *Yanjiang yu lunwenji* (Sun Zhouxing, Trans.) (pp. 3–37).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san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Heidegger, M.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Verlag Günther Neske.)
- 馬丁·塞爾(2008)。〈實在的傳媒和傳媒的實在〉。西皮爾·克萊默爾(編)，《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像和新傳媒》(孫和平譯)(頁215–2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Mading Saier (2008). Shizai de chuanmei he chuanmei de shizai. In Xipier Kelaimoer (Ed.), *Chuanmei, jisuanji, shizaixing—Zhenshixing biaoxiang he xin chuanmei* (Sun Heping, Trans.) (pp. 215–237).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馬丁·布克哈特(2008)。〈在電磁流中：作者和電磁書寫〉。西皮爾·克萊默爾(編)，《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像和新傳媒》(孫和平譯)(頁18–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Mading Bukehate (2008). Zai diancilu zhong: Zuozhe he dianci shuxie. In Xipier Kelaimoer (Ed.), *Chuanmei, jisuanji, shizaixing—Zhenshixing biaoxiang he xin chuanmei* (Sun Heping, Trans.) (pp. 18–45).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ämer, S. [1998]. *Medien-computer-realität: Wirklichkeitsvorstellungen und neue medien*. Berlin: Suhrkamp.)
- 馬庫斯·加布里爾(2021)。《為甚麼世界不存在》(王熙、張振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Gabriel, M. [2013]. *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 Berlin: Ullstein Verlag.)
- Makusi Jiabulier (2021). *Weishenme shijie bu cunzai* (Wang Xi, Zhang Zhenhua,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Original book: Gabriel, M. [2013]. *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 Berlin: Ullstein Verlag.)
- 馬克思·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2003)。《啟蒙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19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 Makesi Huokehaimo, Xiaoduo Adaoernuo (2003). *Qimeng bianzhengfa* (Qu Jingdong, Cao Weid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Original book: 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19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 埃德加·莫蘭(2002)。《方法：天然之天性》(吳泓縉、馮學俊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Morin, E. [1973]. *Le paradigme perdu: La nature humai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Aidejia Molan (2002). *Fangfa: Tianran zhi tianxing* (Wu Hongmiao, Feng Xuejun,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orin, E. [1973]. *Le paradigme perdu: La nature humai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埃德加·莫蘭(2011)。《時代精神》(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Morin, E. [1962]. *L'Esprit du temps: Essai sur la culture de masse*. Paris: Grasset.)
- Aidejia Molan (2011). *Shidai jingshen* (Chen Yizhua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orin, E. [1962]. *L'Esprit du temps: Essai sur la culture de masse*. Paris: Grasset.)
- 唐·伊德(2012)。《技術與生活世界：從伊甸園到塵世》(韓連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Ihde, D.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ang Yide (2012). *Jishu yu shenghuo shijie: Cong Yidianyuan dao chengshi* (Han Lianqi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Ihde, D.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孫瑋(2015)。〈微信：中國人的「在世存有」〉。《學術月刊》，第12期，頁5-18。
- Sun Wei (2015). Weixin: Zhongguoren de "zaishicunyou." *Xueshu yuekan*, 12, 5-18.
- 孫瑋、黃旦(2012)。〈超越結構功能主義：中國傳播學的前生、今世和未來〉。《新聞大學》，第2期，頁1-4。
- Sun Wei, Huang Dan (2012). Chaoyue jiegou gongneng zhuyi: Zhongguo chuanboxue de qiansheng, jinshi he weilai. *Xinwen daxue*, 2, 1-4.
- 黃旦(2018)。〈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0期，頁60-81。
- Huang Dan (2018). Xinwen chuanbo xuekehua licheng: Meijieshi jiaod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0, 60-81.
- 斯圖亞特·霍爾(2021)。《文化研究 1983：一部理論史》(周敏、程孟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Hall, S. [2016].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 Situyate Huoer (2021). *Wenhua yanjiu 1983: Yibu lilun shi* (Zhou Min, Cheng Mengli,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Original book: Hall, S. [2016].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詹姆斯·凱瑞(2005)。《作為文化的傳播》(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Carey, J. W.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Zhanmusi Kairui (2005). *Zuowei wenhua de chuanbo* (Ding Wei,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arey, J. W.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詹姆斯·格雷克(2013)。《信息簡史》(高博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原書Gleick, J. [2011].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 Zhanmusi Geleike (2013). *Xinxi jianshi* (Gao Bo, Trans.). Beijing: Renmin youd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leick, J. [2011].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 詹姆斯·凱利(2013)。〈凱利序〉。哈羅德·伊尼斯,《變化中的時間觀念》(何道寬譯)(頁17-34)。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書Innis, H. A. [1952].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Zhanmusi Kaili (2013). Kaili xu. In Haluode Yinisi, *Bianhua zhongde shijian guannian* (He Daokuan, Trans.) (pp. 17-34).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Innis, H. A. [1952].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雷蒙·威廉斯(2011)。《文化與社會》(高曉玲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書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imeng Weiliansi (2011). *Wenhua yu shehui* (Gao Xiaoling, Trans.). Changchun: Jilin chuban jituan youxianzeren gongsi. (Original book: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雷·庫日韋爾(2014)。〈為甚麼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奇普·沃爾特,《重返人類演化現場》(蔡承志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Walter, C. [2006]. *Thumbs, toes, and tears, and other traits that make us human*. New York: Walker & Co.)
- Lei Kuriweier (2014). Weishenme women shi duyiwuer de. In Qipu Woerte, *Chongfan renlei yanhua xianchang* (Cai Chengzhi, Trans.).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Walter, C. [2006]. *Thumbs, toes, and tears, and other traits that make us human*. New York: Walker & Co.)

- 雷吉斯·德布雷 (2014)。《媒介學引論》(劉文玲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書 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Leijisi Debulei (2014). *Meijiexue yinlun* (Liu Wenli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瑪格特·伯格豪斯 (2016)。《魯曼一點通：系統理論導引》(張錦惠譯)。新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Berghaus, M. [2011]. *Luhmann leicht gemacht: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theorie*. Cologne: Böhlau.)
- Magete Bogehaosi (2016). *Luman yidiantong: Xitong lilun daoyin* (Zhang Jinhui, Trans.). Xinbei: Nuannuan shuwu wenhua shiye gufen youxiangongsi. (Original book: Berghaus, M. [2011]. *Luhmann leicht gemacht: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theorie*. Cologne: Böhlau.)
- 齊格弗里德·齊林斯基 (2020)。〈未來考古學：在媒介的深層時間中旅行〉(唐宏峰、呂凱源譯)。《當代電影》，第4期，頁42-48。
- Qigefulide Qilinsiji (2020). *Weilai kaoguxue: Zai meijie de shenceng shijian zhong luxing* (Tang Hongfeng, Lü Kaiyuan, Trans.). *Dangdai dianying*, 4, 42-48.
- 趙汀陽 (2022)。《人工智能的神話或悲歌》。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ao Tingyang (2022). *Rengongzhineng de shenhua huo beige*.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 趙汀陽 (2023)。《跨主體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Zhao Tingyang (2023). *Kuazhutixing*.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 shudian.
- 諾伯特·埃利亞斯 (2018)。《符號理論》(熊浩、高樂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Elias, N. [1991].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Nuobote Ailiyasi (2018). *Fuhao lilun* (Xiong Hao, Gao Letia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Original book: Elias, N. [1991].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麗莎·吉特爾曼 (2023)。《新新不息：媒介、歷史與文化數據》(陳鑫盛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書 Gitelman, L. [2006]. *Always already new: Media, history, and the data of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 Lisha Jiteerman (2023). *Xinxinbuxi: Meijie, lishi yu wenhua shuju* (Chen Xinshe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itelman, L. [2006]. *Always already new: Media, history, and the data of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0期(2024)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Hall, S. (2007).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A. Gray et al. (Eds.),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 2* (pp. 386–398). London: Routledge.

Williams, R. (1966). *Communica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lliams, R. (1974). Communications as cul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3), 17–25.

本文引用格式

黃旦 (2024)。〈傳播範式的變更：媒介學的興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0期，頁153–184。